

科學博物館、生物學知識與國族意識

陳叔倬¹

摘要

博物館史的相關研究已經顯示，國族意識在博物館制度化的過程中產生關鍵性的影響，舉世皆然。即使到了當代，博物館的公民性、開放性被不斷地強調，國族意識似乎仍然存在於許多博物館展示空間中。歷史性或藝術性的博物館或許較容易操作以貼近國族意識；相對而言，科學性的博物館標榜著科學理性，並且肩負著傳播科學知識的使命，又如何面對國族意識？如果科學博物館選擇貼近國族意識，則其中科學性知識——尤其是生物學知識又會如何詮釋國族意識，溝通國族認同？本論文藉由研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及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博物館展示與博物館誌歷史檔案，探討科學博物館中生物學知識與國族意識的關聯性。

關鍵詞：科學博物館、生物學知識、國族意識

國族主義與博物館

博物館史的相關研究已表明國族主義在博物館制度化的過程中產生關鍵性的影響，舉世皆然（張正霖，2005）。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一書中，指出博物館和集體記憶的關係非常緊密，是書寫歷史、建構國家論述的重要機構。李威宜(2005)於〈去殖民與冷戰初期臺灣博物館建置的國族想像(1945-1971)〉一文中，亦藉由書寫1945年到1971年間「日本殖民博物館的接收轉

型」和「中國博物館的移入再生」兩條博物館軌跡的建置，闡明國民政府透過博物館的空間，建構國族的邊界與內涵；內部的國族階序與外部的國際認同，透過展覽的圖像機制進行自我形象與敵人形象的「政治分類」，以及透過文物的實體存在動員召喚「被殖民的臺灣民眾」與「戰爭移入的流亡社群」的歷史記憶，從而在民眾的精神層面深烙國族圖像的集體想像過程。

20世紀中葉時，博物館擺脫過去菁英主義，被賦予教育的任務，視為教育的殿堂，將精緻文化傳播到普羅大眾

¹ E-mail: shujuo@nmns.edu.tw

階層成為當時的使命，比 20 世紀之前的菁英文化堡壘觀念前進許多。80 年代以降，博物館更承受了激烈轉化的壓力，其一為民主化的壓力。全世界，無論先進與落後的國家，隨著政治上民主思想的深化，公民的文化權受到重視（漢寶德，2009）。國家不會放過這個「教育」大眾的好機會；但也因為公民意識的高漲，國家也必須接受公民的挑戰。美國的博物館在進行大眾教育時，確實也面臨這樣的挑戰。S. D. Lavine 和 I. Karp (1991) 指出：「任何展示都不免偏向某些文化假設以及製作展示者所擁有的資源，這種展示性質使得強調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的美國博物館成為一種被爭論的地界 (a contested terrain)。」同樣的 80 年代開始，後現代思潮亦對於知識生產進行重新檢視。對於國族意識，後現代政治學提出質疑，從「國族是什麼？」轉變成「國族被如何展現？」。當國族意識在博物館空間中呈現，後現代博物館也提出疑問：從「展示些什麼？」轉變成「是誰在詮釋展示？」、「是誰被教育？」、「展示者得到了誰的授權？」。在探究國家以國族意識面對博物館時，更須關注國家是否得到授權，利用博物館來傳達特定的國族意識？還是一般大眾已能夠反客為主，藉由民主思想甚至行動，對國家特定的國族意識進行抗爭？

臺灣生產博物館的速度與數量，較之歐美國家不遑多讓。但是，博物館愈是豐盛地繁殖，不同博物館所建構「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 意識的內容，愈令人困惑。李威宜 (2005) 在上文中提到，由於陸續受到日本殖民、國共對峙、國際冷戰、威權獨裁、現代西化、民主發展、兩岸競爭等政治力量的衝擊，使得臺灣博物館的社群想像，敏銳地呈現出不斷變動的複雜性與矛盾性。90 年代以來蜂擁的地方博物館更由於與社區總體營造、族群運動、地方認

同以及國族打造等政治力量聯結，而產生地方想像與國族想像混雜建構的矛盾現象；另一方面，由於臺灣國家民族認同的多元，使得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臺灣博物館、臺灣歷史博物館等國家級博物館，出現定位衝突的現象，成為政治角力的重要戰場。不同博物館各有不同的基本特性與人群特質，面對國族意識又各自發展出何種對應邏輯或隱藏何種內在規則？或更進一步的選擇如何實踐？如何對抗？

生物學知識與國族意識

可惜的是，上述關於國族意識在博物館展示的討論中，都未討論科學性知識的角色。歷史性或藝術性的博物館或許較容易操作以貼近國族主義；相對而言，科學性博物館標榜著科學理性，並且肩負著傳播科學知識的使命，是否就從國族意識的戰場上免疫？若科學性博物館無法隔絕於國族意識的影響，則其中科學知識，尤其是生物學知識，被操作用來詮釋與溝通國族意識的手法與作用機制，與歷史性、藝術性博物館有何不同？

在社會科學理論中，認同的形成主要分為原生論與情境論。原生論強調認同建立於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徵 (Geertz, 1973; Keyes, 1976)。情境論強調認同是人為建構，可隨不同情境而改變 (Barth, 1969; Anderson, 1983)。對一般大眾而言，親屬認同絕對由原生狀態所決定。原生論包含了兩個重要的性格：根源性與不變性。根源性強調與生俱來的關係連結，無須進行任何驗證說明；不變性則進一步強調如此關係連結永遠不會改變。原生論起源於親屬的血源認同：源自於同一確定的祖先，即可與家譜紀錄緊密結合形成親屬認同，僅有被認養者必須憑空建立親屬認同。在傳統人類

社會中，所有比親屬組織更大的團體，皆是由親屬組織往外擴展而成 (Descola, 1996: 87)，因此唯有分享共同的祖先，是一般大眾認定個人選擇群聚最傳統的定義 (Abizadeh, 2001)，這也是為何一般民眾認為個人的族屬應該決定於血源、遺傳等原生特性的原因 (Dauksas, 2007)。更進一步，族屬認同又與國族認同有絕對的關連 (Smith, 1998: 222)。現代國家具有兩種特質，一種是自然的、認為可依照生物性劃分界線、擁有原生遺傳命定的迷思特質；一種是經由文化表徵凝聚成國族政治的事實特質 (Gellner, 1983: 48-49)。然而，當國族政治運作中許多家庭用親屬稱謂被使用，例如兄弟、姊妹、家鄉、母語、祖居地等去凝聚個人意識時，可以清楚看到個人血源過渡到國族構成的痕跡 (Eriksen, 2004: 58-60)。因此，根植於共同祖先的原生情感被一般民眾認為是國族的基礎。如果一個虛無飄渺的祖先能夠被生物學知識加以確認，則國族意識就可以輕易地被發明。因此當臺灣國民議會為了宣揚臺灣民族獨立革命所出版《常識》一書中，除了提到：「凡是生長或長期居住在臺灣，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而且願意打拼成為臺灣國家主人的，攏是臺灣人。」卻在同一頁標註：「根據 DNA 研究指出，臺灣有 85% 的福佬人、客家人有原住民血統」，以強調臺灣漢人的遺傳基因與中原漢人有生物性的原生差異 (臺灣國民會議，2009: 15)。

當國族意識被原生論加以包裝時，卻忘了國族相較於親族，是絕對多變的一種人群團體。親族是人類發展過程中最早形成的人群團體，國族卻是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的獨特產物。只有伴隨著 18 世紀以來長期而激烈的政治、經濟、文化變遷，西方的人民 (people) 才有可能被形塑成國族 (nation-state)。然而，弔詭的是，儘管國族有著不容否認的現代性色彩，國族主義者對其自身國族的表述

與宣示，卻幾乎毫無例外地指向渺遠的過去，企圖為國族的起源提供堅實的歷史基礎：19 世紀法國歷史學者之所以將法國王室的世系向前追溯到高盧人，甚至古希臘時代的特洛伊人；英國歷史之所以必須溯源到 1066 年的征服者威廉；1860 年才完成統一建國大業的現代義大利人之所以要宣稱其為古羅馬的直接繼承者；採用西班牙文為「國語」的墨西哥人之所以將其祖源延伸到久經湮沒的阿茲特克人與馬雅人，可以說都是國族主義內在邏輯的當然產物 (沈松橋，1997)。對此，大力推動此一想法的行動者也意識到，原生論性格中的不變性，提供了連結渺遠過去與現代的保證。

但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即使是渺遠的過去也可以被重新塑造。日本學者小熊英二指出，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準，相關學者（特別是日本學者）關於「日本民族起源」的討論，戰前和戰後的說法有著極大的差距。現在普遍流行的將日本視為是一個「自古閉鎖在四個主要島嶼之單一民族」的想法，是戰後才定型。相對的，戰前的日本則是充斥著各種「日本是複合民族或多民族」的論調，這些所謂「日本人是複合民族」的論調在大東亞戰爭時更被廣泛使用，主動成為正當化侵略的藉口 (許維德，2006)。

炎黃始祖傳說與中國國族意識的結合，更是一個清楚的例證。對各帝制朝代而言，黃帝是政治權威的象徵，表示「皇統」的連結。至於流傳民間的黃帝傳說，則以「仙話」的形式，構成與官方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敘事系統。然而，進入 20 世紀之後，官式的黃帝論述結構，產生急遽變化。黃帝雖然依舊維持其固有的「先祖」地位，卻已不再是一朝一姓專屬的祖源，而變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換言之，「黃帝」作為一項認同符號，殆已脫離舊有 20 世紀之帝王世系的「皇統」脈絡，轉而被

納入新起之民族傳承的「國統」脈絡，為中國國族認同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文化符號。然而，以黃帝符號為中心所塑造出來的中國國族意識，卻囿於晚清反滿革命的政治現實，仍然維持以血緣為根基進行聯繫的本質，並帶有一定排拒外族個性的族群團體（沈松僑，1997）。

博物館是書寫歷史、建構國家論述的重要機構 (Anderson, 1983)。80 年代以降，博物館的教育性一再被強調，生物學知識即為博物館教育中重要的項目。同樣被設定與國族意識互相流通，博物館如何利用生物學知識從根本鞏固國族意識？或相反的進行連根拔除的對抗？人類學家湯馬士 (Nicholas Thomas) 在討論物在不同時空中的意義時指出「物並不在於它過去如何被造成的，而是它會變成什麼」。在此，我們也可以說：「生物學知識原來是什麼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博物館中如何被呈現。」 (Thomas, 1991)

本文即嘗試討論科學博物館中，生物學知識如何傳播或對抗國族意識，並藉此探討科學知識在傳播特定意識的合適性。為了達成上述目標，選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館）與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博物館展示內容與博物館誌歷史檔案，作為本文的研究材料進行分析。

科博館中生物學知識的國族意識呈現

誠如麥克林 (Fiona McLean) 所言，博物館基本上是很政治的 (McLean, 1997: 29)，尤其是「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往往是政治的產物，象徵執政者的意識型態，甚至於在政治權力更迭中，與執政黨之國家認同呈現一致性（曾信傑，2010）。作為國家重要的自然史博物館之一，科博館在傳遞生物學

知識時，如何與國族意識溝通？

科博館興建之議始於 1980 年公布的國家 12 項建設文化建設計畫。即使國際外交上遭受到持續不斷的打擊，執政黨當時對內的國家行政仍維持著一個大中國意識的施政格局。科博館的展示內容也依此規劃，「科學中心」首先於 1986 年對外開放，「生命科學廳」於 1988 年對外開放，「中國科學廳」與「地球科學廳」則於 1993 年同時對外開放。其實 1993 年當時國內各界應已感受到國族意識的強烈變動，主要轉捩點是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隨著國會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被選舉人不包括大陸地區，僅限於臺澎金馬地區，揭示了國族意識內容由中國轉向臺灣的根本改變。

1993 年開放的「中國科學廳」必須面對此衝擊。「中國科學廳」開展時設有常設展「中國醫藥」、「中國的科學與技術」、「中國人的心靈生活」、「古代中國人」、「中國農業生態」以及「臺灣南島語族」6 個展廳，以中國為名者占 5 個，臺灣為名者一個。儘管今日科博館的網頁資訊以「為了包容多元的人類文明與拓展世界文化研究領域」為由，自 2007 年 11 月起將「中國科學廳」更名為「人類文化廳」，以涵蓋 2007 年全新推出的「大洋洲」以及「農業生態」更新，以及 2008 年「臺灣南島語族」更新。無法確知當時更改主展廳名稱「中國科學廳」為「人類文化廳」、展廳名稱「中國農業生態」為「農業生態」廳是否與國內國族意識變動有關，但展廳中以中國為名者仍占多數，計有「中國醫藥」、「中國的科學與技術」、「古代中國人」。有趣的是，「中國人的心靈」展廳名稱則呈現不完全轉向：在館內展廳中仍維持「中國人的心靈生活」(Chinese Spiritual Life) 名稱，但在解說摺頁則換成「漢人的心靈生活」(The Spiritual Life of Han People)（圖 1）。不完全轉向顯現出國族意識

變動確實造成影響：從以國家為標的的中國意識，轉向為以人群為標的的漢人意識。然而如此更名並無法達成預期效果，因為傳統上民眾並不會對於「中國人」與「漢人」指涉的意義加以區分。過去研究顯示，漢人認同基本上偏向於原生論：只要父親是漢人，其子嗣就是漢人，歷史上漢人認同從來就不被混血概念所混淆 (Ebrey, 1996)。近代中國國族認同的形成過程，又與漢人民族認同高度重疊 (Brown, 2004: 40；沈松橋，1997)，因此一般民眾認為漢人意識與中國國族意識密不可分 (陳叔倬、段洪坤，2008)。展廳更名過程有意識的以「漢人」取代「中國人」在不完全轉向中留下證據，應可證實科博館在面對國族意識變動時確實對展廳名稱進行特殊考量。

即使如此，其他以中國為名的展廳仍維持著濃厚的中國國族意識，包括「古代中國人」展廳，其中富含的生物學知識，則是本文主要檢驗如何與國族意識溝通的對象。該展廳主要以考古出土器物為展示主體，但在「中國境內的舊石

器時代人類與文化」展櫃中，展出多具頭骨複製品，包括山頂洞智人頭骨、柳江晚期智人頭骨、長陽早期智人上顎骨、馬壩早期智人頭骨、洛南直立人右上第一臼齒、大荔早期智人頭骨、藍田直立人復原頭骨和下顎骨、北京直立人頭骨等複製品。即使內文中提到「在臺灣地區也發現這個時代的遺址，包括在臺灣縣左鎮菜寮溪發現的左鎮人……」。當左鎮人頭骨複製品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常設展展出時，科博館的古代中國人展廳展出的是出土於大陸的頭骨複製品，卻缺少臺灣出土的頭骨複製品。

除複製頭骨外，還展出這些頭骨的復原半身像，包括中世紀祿豐古猿復原半身像、藍田直立人復原半身像、北京直立人復原半身像、馬壩早期智人復原半身像、柳江晚期智人復原半身像等。以生物學知識而言，中世紀祿豐古猿經鑑定為猿類，絕非人類；即使是藍田直立人與北京直立人，皆於數十萬年前滅絕，亦非東亞現代智人的祖先。祿豐古猿化石經定年為中新世晚期，距今 1,000 萬年至



圖 1. 科博館展廳標示的「中國人的心靈生活」展廳（左），在人類文化廳摺頁中介紹為「漢人的心靈生活」展廳（右）（攝影／陳叔倬，攝自科博館）。

500 萬年；這個年代人科南猿屬都還未出現。藍田直立人化石定年距今約 100 萬年至 50 萬年，北京直立人化石定年距今約 70 萬年至 20 萬年，但仍與現代智人無演化關係（賈蘭坡、黃慰文，1996）。

近代遺傳學證據證實所有現代智人是 15 萬年前在非洲起源。1987 年 UC Berkeley 的 Cann, Stonking 和 Wilson 實驗全球不同人群間的粒線體 DNA (Mitochondria DNA; mtDNA) 變異推測所有現生人發源於非洲。Cann 等對來自世界各地 147 例個體的粒線體 DNA 限制多態性資料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所有個體分為 2 枝，最古老的一個分枝僅有非洲人分佈，其他大洲和一部分非洲人的粒線體 DNA 在另一個年輕分枝中。他們以此提出「粒線體夏娃」(Mitochondria Eve) 理論，並藉由突變率推斷所有現代人的粒線體 DNA 都來自一位 15 萬年前的非洲女性。直到 10 萬年前，部分的非

洲現代人才走出非洲，代替了各地的古人類，並成為目前各大洲現代人的祖先 (Cann et al., 1987)。

2001 年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柯越海等對主要以華人為主的東亞人群進行了大規模的 Y 染色體多樣性單倍型分析，經分析東亞 12,127 個男性個體，發現所有樣本都帶有某特定突變 (M168)，與所有非非洲人一般。反之只有一部分非洲人帶有此突變，更多的非洲人不帶有此突變。經推測此特定突變是現代智人即將離開非洲時才產生，因此非非洲人都帶有此特定突變，而不帶有此突變者都在非洲。由此推斷，東亞人群起源於非洲。至此，東亞現代智人的起源已然確定，與北京直立人無關 (Ke et al., 2001)。早於 15 萬年前存在於東亞的猿科或人科動物都與現代智人無直接演化關係，祿豐古猿、藍田直立人、北京直立人放置在「古代中國人」展廳並不合適。



圖 2. 「古代中國人」展廳展出的中世紀祿豐古猿復原半身像，提供民眾與「渺遠過去」連結的想像（攝影／陳叔倬，攝自科博館）。



圖 3. 「古代中國人」展廳展出的藍田直立人與北京直立人頭骨複製品（攝影／陳叔倬，攝自科博館）。

「古代中國人」展廳另設有「北京人的生活」實物造景，提供下列解說：「北京直立人舊稱為北京猿人，是我國境內最早發現的直立人，出土於河北省房山縣周口店龍骨山的洞穴堆積中……距今 50 萬到 23 萬年前。」很明顯的，50 萬到 23 萬年前中國尚未出現，在此將北京直立人、藍田直立人，甚或是祿豐古猿展示於「古代中國人」展廳，其用意僅在於提供中國人一個與「渺遠過去」連結的想像，而且此想像時間跨度極大，橫跨東亞現代智人至猿科始祖，遠較征服者威廉之於英國人、古羅馬人之於義大利人、馬雅人之於墨西哥人更久遠。

90 年代以來隨著政治解嚴、國會全面改選帶動的臺灣國族意識提昇，「古代中國人」展廳中的生物學知識以及關於臺灣史前文化起源的論點，屢遭訪客投書質疑，也促使館方認真思考，更新「古代中國人」展廳，將為更新「人類文化廳」內容的第一要務。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中生物學知識的國族意識呈現

相較之下，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中生物學知識的國族意識呈現，與科博館截然不同。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成立於 2007 年，即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已有 7 年。建築原是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校舍，其間經歷教室、行政中心、全臺醫學學術活動據點、醫學教育改革基地、醫學人文教育場所，直到 2007 年成立博物館，是臺大醫學院現存最早建物（圖 4）。或許因為原建築與臺灣現代醫學發展歷史極其相關，抑或傳統上臺大醫學院師生原本即有較高的臺灣意識，因此館中展示呈現出濃濃的臺灣國族意識。館中設有「臺灣人哪裡來」常設展介紹臺灣人起源的生物性知識，隱含的國族意識迥異於科博館的古代中國人展廳。雖然一些生物學知識無涉國族意識，包括「生命的起源」、「靈長類的演化」、「人與猿的區別」介紹人在生物演化上的地位、「人類的演化與遷



圖 4.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址為臺大醫學院現存最早建物（攝影／陳叔倬）。

徙」介紹人類的發展、「人骨因風俗而改變」介紹體質與文化的交互作用等；但另一些展示內容即與國族意識息息相關，包括「體質人類學研究室」介紹日治時期臺北帝大醫學部解剖學科的歷史、「臺灣是移民社會」介紹臺灣漢人多元組成的歷史、「臺灣原住民體質特徵」介紹臺灣原住民有別於其他人群的身體特徵以及「墾丁寮遺址」探討史前臺灣人和現住民的關連，並依照出土遺骨復原墾丁寮文化人的面貌。

在「臺灣人哪裡來」常設展解說摺頁上可以發現該館特別著重於臺灣原住民悠久歷史以及臺灣漢人組成多元的內容介紹：「……太平洋島民遷徙故事，主角是『南島語族』。語言學的追溯認為南島語族應有共同祖先，自新石器時代開始從亞洲逐漸擴散至大洋洲，並持續到約八百年前才抵達最偏遠的島嶼。語言學與考古學以及細菌學，目前大抵支持『出臺灣』(Out of Taiwan) 模型，

推論南島語族很可能由臺灣擴散。由於臺灣地處樞紐，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先後到來。考古研究顯示，臺灣早在數萬年前就已有人類居住，時間層次可追溯至 5 萬年前的史前時期。而在 16、17 世紀時，臺灣正式進入有文字紀錄的歷史時期，外來政權的更迭，使漢人人口大幅成長，改變臺灣原本以原住民為主的族群結構，形成今日以漢人為主體組成的社會。多元族群譜出的臺灣史，使『臺灣人』的面貌更趨多樣。」（圖 5）然而以上內容介紹根據的是歷史知識的推論，生物學知識並不一定支持。國人大眾所熟知的臺灣漢人起源是大陸東南沿海閩客原鄉，早期來到臺灣後與原住民臺灣的原住民族以及殖民臺灣的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等非漢民族互動，理論上似乎確實可能造成當代臺灣漢人遺傳組成多元，但實際上並非絕對。族群遺傳學的生物學知識比較基礎是群體，綜論某群體遺傳組成中外群基因流入的



圖 5.「臺灣人哪裡來」解說摺頁外頁與內頁（攝影／陳叔倬，翻拍自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解說摺頁）。

比例。外群基因流入的程度與人口比例有關：若非漢人與漢人互動過程中，持續維持高人口比例，則其基因在漢人的基因組成中將容易留下來；若非漢人的人口比例較低或中間接觸時間短，則非漢人的遺傳基因在漢人間將容易漂流散失（genetic drift），也就是即使有非漢人祖先基因在早期混入，在當代也可能測不出非漢基因。

上述歷史知識與生物學知識之間的辯證關係往往被大多數學者忽略，更遑論博物館策展人，也因此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中的展示，亦出現歷史知識與生物學知識之間的矛盾。在近期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推出的「臺灣人哪裡來（二）：現代科技所揭露的人的根源」

特展中，特展說明提到：「一直以來，人類的演化過程大多是依靠人骨化石的型態學研究來解釋，但因分子生物學的發展，近年來已經可以利用我們自己的遺傳因子來分析、探討人類演化及臺灣人的起源。」揭示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能夠驗證歷史知識與生物學知識之間的關係。其中生物學知識的真實性在「使用 DNA 來探討人類演化及臺灣人的起源」展櫃中確認。在「臺灣原住民和漢人及中國南部漢人的單倍群比例的比較」一圖中，展示說明直接敘述「臺灣漢人與中國南部漢人有著比較相似的單倍群組成，與臺灣原住民則有明顯差異。這也說明了臺灣原住民與臺灣漢人的起源不同。」（圖 6）此圖顯現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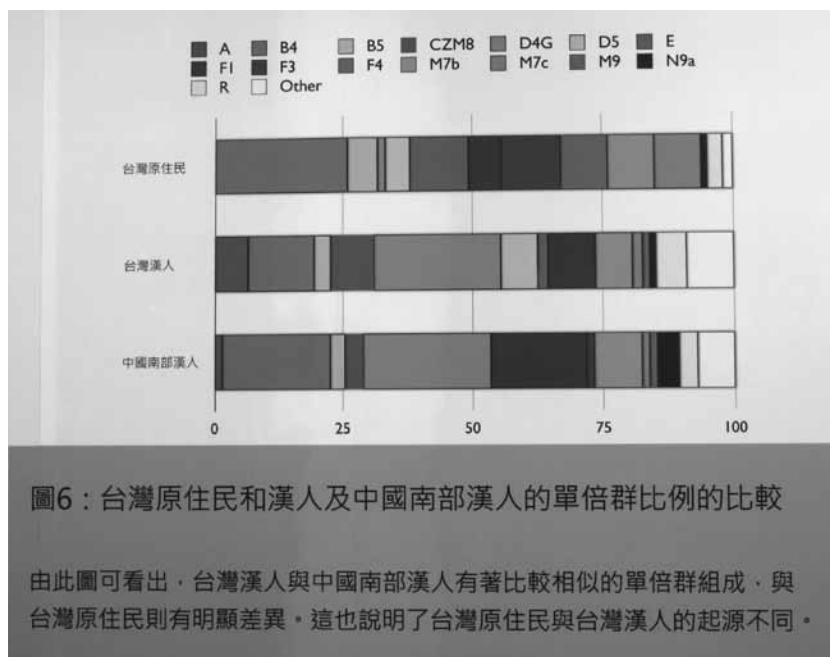


圖 6. 臺灣原住民和漢人及中國南部漢人的單倍群比例的比較（攝影／陳叔倬，攝自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

物學知識即是臺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遺傳組成仍高度相似，與臺灣原住民族有明顯不同，也就是以歷史知識推論臺灣漢人的組成多元，在生物學知識上站不住腳。為何此展在生物學知識不支持的前提下，開宗明義宣告「臺灣漢人多元組成」呢？這與近 10 年來國內盛行臺灣國族意識氛圍下，一些原生論的支持者刻意操作生物性知識，詭證臺灣漢人與中國漢人在根本源流上存在著明顯差異，尤其誤導大眾相信臺灣漢人與臺灣原生族群原住民族間有高度混血，嘗試與中國國族意識劃清界限有關（陳叔倬、段洪坤，2008，2009）。

諷刺的是，生物學知識也不支持一個完整的中國國族，也就是說強調漢人都是炎黃子孫的歷史想像在生物學上同樣站不住。傳統遺傳指標的研究早已清楚顯示，中國北方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間存在著極大的遺傳差異 (Zhao and Lee,

1989; Chu et al., 1998)。2004 年中國南北漢人的 Y 染色體與粒線體 DNA 多樣性研究進一步指出 (Wen et al., 2004)，漢人從北到南 3 次歷史大遷徙，其結果是中國南方漢人男性保留極多的中國北方漢人男性的遺傳特性，但中國南方漢人女性保留較多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女性的遺傳特性。在「使用 DNA 來探討人類演化及臺灣人的起源」展櫃揭露了同樣的訊息。在「以粒線體 DNA 的單倍群出現頻率計算東亞地區族群的遠近關係（以集群分析法）」一圖中，展示說明同樣敘明「臺灣（及中國南部漢人）與日本、韓國及中國東北部族群有很大的差異」（圖 7）。其中中國南方漢人偕同臺灣漢人，顯現出與臺灣原住民族群集，建立在臺灣原住民族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侗臺語族有同源關係的基礎上，而非臺灣漢人血源中有大量臺灣原住民族混入。侗臺語系族群分佈在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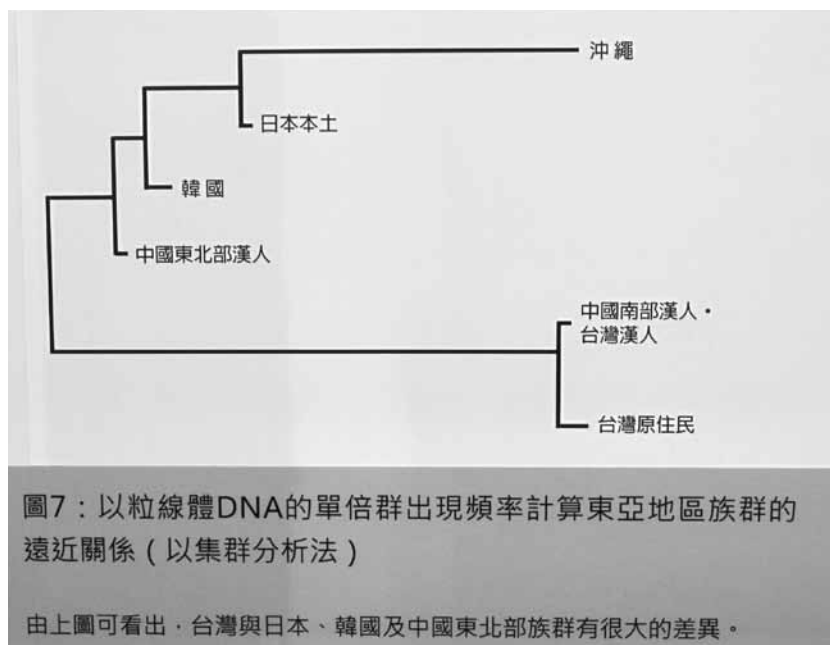


圖 7. 以粒線體 DNA 的單倍群出現頻率計算東亞地區族群的遠近關係（攝影／陳叔倬，攝自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

泰國、越南、中國、緬甸、印度等國邊境，直到今日仍有 30 種語言被使用。有意思的是，語言學家指出原住民語與侗臺語可能共同源自於古侗臺語 (Benedict, 1984; Ni, 1994)，最近的遺傳人類學研究也指出原住民族或與侗臺語系族群有祖源關係 (Li et al., 2008)。進一步分析顯現出與圖 6 同樣的結果，即臺灣原住民族血源混入臺灣漢人中的比例，遠低於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血源混入中國南方漢人的比例，造成臺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血源仍高度相似。臺灣漢人身上帶有的非漢血源在渡臺先祖還未來臺之前即已混入，也就是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所影射的狀況，早在渡臺前就長期發生（陳叔倬、段洪坤，2008，2009）

以上「使用 DNA 來探討人類演化及臺灣人的起源」展示內容中所顯現的生物學知識與國族意識的衝突，進一步提醒客觀的科學性知識不應該隨著多變

的國族意識起舞。

結語

現代民族國家運用博物館的建制進行國族想像建構，如果主權、土地、公民與文物等範疇的想像邊界一致的話，往往能夠得到不證自明的國族認同效果。不過，博物館這種再現國族的機構，在臺灣卻不斷暴露文物想像與國族認同之間的矛盾。博物館在臺灣的建制過程，便是因為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動，而由每一次獲得主權的政治中心，牽引而出，形成其多元發展與變形的軌跡（李威宜，2005）。對以上兩個博物館在操作生物學知識呈現國族意識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國族意識確實影響了策展人選擇以及解釋生物學知識的態度。對此我們必須嚴肅面對以下問題：一、博

物館的功能是呈現生物學知識？還是檢驗生物學知識？二、當博物館選擇擁抱國族意識時，其中展現的生物學知識能否維持其科學中立性格？

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曾經提到，現代博物館如今生活在「未來」而非「過去」的歷史之中；博物館實踐的參照點已非傳統與自然界，而是在瞬息萬變的現實中往往要立即的根據判斷從事反思、從事決策的狀況 (Giddens and Pierson, 1999)。當前臺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所遭遇的，不但涉及對世界的一系列觀點與態度，更涉及複雜的工業生產與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擴展、

獨立進行運作的民族（國家）與民主的制度，以及科學與技術的變革等現代性 (modernity) 的議題（王嵩山，2005）。但是對於國族意識，即使博物館無可避免必須與之對話，關於生物性知識以及所有科學性知識的展演，應該儘可能維持其中立客觀的角色，才不至於讓博物館中的國族意識「成也生物學知識，敗也生物學知識」。

誌謝

本文感謝論文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讓論文更臻完善。

參考文獻

- 王嵩山，2005。導論。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王嵩山主編，頁：15-22。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2010。導論，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王嵩山主編，頁：5-14。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臺灣國民會議，2009。臺灣民族獨立運動常識。臺灣國民會議製作。
- 李威宜，2005。去殖民與冷戰初期臺灣博物館建制的國族想像 (1945~1971)。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王嵩山主編，頁：367-390。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沈松橋，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 1-77。
- 許維德，2006。關於「民族起源」的文化政治：以「臺灣原住民起源」相關論述為核心的探索。「文化與族群的形成與再創造」工作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9月13日，臺北。
- 陳叔倬、段洪坤，2008。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2: 137-173。
- 2009。臺灣原住民祖源基因檢驗的理論與統計謬誤，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6: 347-356。
- 曾信傑，2010。政治對博物的影響：以國家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24(4): 95-113。
- 賈蘭坡、黃慰文，1996。發現北京人。臺北：幼獅出版社。
- 張正霖，2005。博物館、公共性與國族建構：以十九世紀之倫敦國家畫廊為分析對象。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王嵩山主編，頁：343-366。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漢寶德，2009。尋找博物館的核心價值。製作博物館，王嵩山主編，頁：007-008。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Abizadeh, A., 2001. Ethnicity, race, and a possible humanity. *World Order*, 33: 23-34.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 Barth, F. (Ed.),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ittle , Brown and Company.
- Benedict, P. K., 1984. Austro-Tai parallel, a tonal Chamic language on Haina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22: 83-86.
- Brown, M. J., 2004.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nn R. L., Stoneking M. and Wilson A. C., 1987. Mitochondria DNA and human evolution. *Nature*, 325: 31-6.
- Chu, J. Y., Huang, W., Kuang, S. Q., Wang, J. M., Xu, J. J., Chu, Z. T., Yang, Z. Q., Lin, K. Q., Li, P., Wu, M., Geng, Z. C., Tan, C. C., Du, R. F. and Jin, L., 1998.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s i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5: 11763-11768.
- Dauksas, D., 2007.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ethnicity: Family and state: A Lithuanian perspective. *In: Wade, P. (Ed.), 2007,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 Perspectives from Kinship and Genetics*, pp. 145-168. Oxford: Berghahn Books.
- Descola, P., 1996. Constructing natures: Symbolic ecology and social practice. *In: Descola, P. and Pálsson, G. (Ed.), 1996, Nature and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82-10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Ebrey, P., 1996.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Brown, M. (Ed.), 1996,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pp. 19-36.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Eriksen, T. H., 2004. Place, kinship, and the case for non-ethnic nation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 49-62.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 197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p. 255-310.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 and Pierson, C., 1999. *Consecration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 Y., Su, B., Song, X., Lu, D., Chen, L., Li, H., Qi, C., Marzuki, S., Deka, R., Underhill, P., Xiao, C., Shriver, M., Lell, J., Wallace, D., Wells, R. S., Seielstad, M., Oefner, P., Zhu, D., Jin, J., Huang, W., Chakraborty, R., Chen, Z. and Jin, L., 2001.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in East Asia: A tale of 12,000 Y chromosomes. *Science*, 292: 1151-1153.
- Keyes, C. F., 1976 Toward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Ethnicity*, 3: 202-13.
- Lavine, S. D. and Karp, I., 1991. *Exhibiting Culture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Li, H., Wen, B., Chen, S.-J., Su, B., Pramoongjago, P., Liu, Y., Pan, S., Qin, Z., Liu, W., Cheng, W., Yang, N., Li, X., Tran, D., Lu, D., Hsu, M., Deka, R., Marzuki, S., Tan, C.-C. and Jin, L., 2008. Paternal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western Austronesian and Daic

- populations.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8: 146.
- McLean, F., 1997. *Marketing the Museu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i, D. B., 1994.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onesian and Bai-Yue languages. *Ethni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 21-35.
- Smith, A. D., 1998.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Thames, N., 1991. *Entangled Objects: Exchange,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n, B., Li, H., Lu, D., Song, X., Zhang, F., He, Y., Li, F., Gao, Y., Mao, X., Zhang, L., Qian, J., Tan, J., Jin, J., Huang, W., Deka, R., Su, B., Chakraborty, R. and Jin L., 2004. Genetic evidence supports demic diffusion of Han culture. *Nature*, 431: 302-305.
- Zhao, T. M. and Lee, T. D., 1989. Gm and Km allotypes in 74 Chinese populations: A hypothesis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um Genet*, 83:1 01-110.

作者簡介

陳叔倬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Science Museums, Biological Knowled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hu-Juo Chen*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museum history has shown how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as influenced museums worldwide. Even in modern museums, in which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ccess are well emphasized, nationalism affects exhibitions. Historical or art museums might be able to operate close to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ontrast, how should a science museum, which is based o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is responsible for dissemina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deal wi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is paper, two of Taiwan's science museum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Medical Humanities Museum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re studi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ological knowled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science museums.

Keywords: Science Museum, Biological Knowledg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Assistant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E-mail: shujuo@nmns.edu.tw